

當代名家叢書・趙園選集・

趙園——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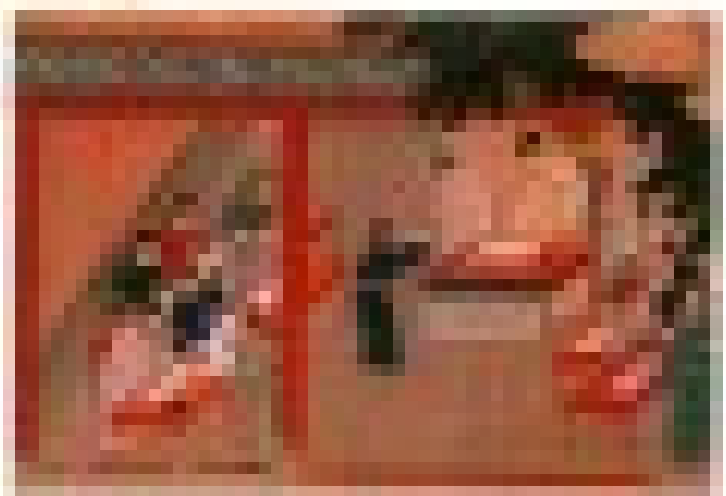
想像與敘述

下冊



學像與教述

二



當代名家叢書・趙園選集

想像與敘述

下冊

趙園 著

當代名家叢書·趙園選集 A0502005

想像與敘述 下冊

作者 趙園

責任編輯 蔡雅如

發行人 陳滿銘

總經理 梁錦興

總編輯 陳滿銘

副總編輯 張晏瑞

編輯所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排版 林曉敏

印刷 百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封面設計 菩薩蠻數位文化有限公司

出版 昌明文化有限公司

桃園市龜山區中原街 32 號

電話 (02)23216565

發行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羅斯福路二段 41 號 6 樓之 3

電話 (02)23216565

傳真 (02)23218698

電郵 SERVICE@WANJUAN.COM.TW

大陸經銷

廈門外圖臺灣書店有限公司

電郵 JKB188@188.COM

ISBN 978-986-496-041-5

2017 年 7 月初版

定價：新臺幣 240 元

如何購買本書：

1. 割撥購書，請透過以下郵政割撥帳號：

帳號：15624015

戶名：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2. 轉帳購書，請透過以下帳戶

合作金庫銀行 古亭分行

戶名：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帳號：0877717092596

3. 網路購書，請透過萬卷樓網站

網址 WWW.WANJUAN.COM.TW

大量購書，請直接聯繫我們，將有專人為您服務。客服：(02)23216565 分機 10

如有缺頁、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Copyright©2016 by WanJuanLou Books CO., Ltd.

All Right Reserved

Printed in Taiwan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想像與敘述 / 趙園著. -- 初版. -- 桃園市：

昌明文化出版；臺北市：萬卷樓發行，

2017.07 冊；公分. -- (當代名家叢書·趙園選集；A0502005)

ISBN 978-986-496-041-5(下冊：平裝)

1.知識分子 2.明代 3.清代

546.1135

106011524

本著作物經廈門墨客知識產權代理有限公司代理，由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集團）有限公司授權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出版、發行中文繁體字版版權。

目次

自序·····	1
---------	---

上冊

那一個歷史瞬間·····	1
--------------	---

甲申年三月十九日·····	1
---------------	---

是日前後·····	15
-----------	----

南—北·····	26
----------	----

山，湖，與海·····	32
-------------	----

兵、賊、盜、虜、義軍·····	35
-----------------	----

當面之敵·····	40
-----------	----

裂變的家族·····	47
------------	----

方死方生·····	50
-----------	----

廢園與蕪城·····	53
------------	----

明末士大夫之營園·····	53
---------------	----

祁彪佳與他的寓園·····	58
---------------	----

作為符號的廢園與蕪城·····	72
-----------------	----

忠義與遺民的故事·····	83
---------------	----

再說祁彪佳其人·····	83
--------------	----

忠義心事	89
「污點忠臣」	93
不經之談	102
最後的抵抗者	107
忠義—遺民	113
遺民—時間	122
所謂「小一代遺民」	127

下冊

想像與敘述

——由明清之際說起	133
-----------------	-----

關於「之際」	133
想像明清之際	143
「突圍」路徑	154
關於明末清初的歷史敘述	165

再說想像與敘述

——以明清之際、元明之際為例	175
----------------------	-----

再談明清之際	176
元明—明清之際	186
「元亡而實未始亡」	198
知識人的元代記憶與想像	202
宋元—明清之際	214
〔附〕關於上個世紀 40 年代的中國文學	219
《流星雨》——如何想像抗戰時期的「大後方」	222

附錄	225
思想・材料・文體——治學雜談之一	225
視野、境界及其他——治學雜談之二	246
尋找入口（代後記）	263
徵引書目	289
新版後記	301

想像與敘述

——由明清之際說起

關於「之際」

先解釋本篇的副標題：為什麼討論關於歷史的「想像與敘述」而截取的是「明清之際」。最簡單的考慮是，限定時段，有利於深入，避免泛泛之論。學術選擇就包括了限定：限定論述範圍、分析工具、解釋框架。限定範圍是做學術的一般原則。僅由操作層面看，限定時段也有其必要性，即如便於線索的彙聚與結合。

當然，選擇「明清之際」，並不止因了上述理由。

「明清之際」的思想史的重要性，經了大量的論述，似乎已無可懷疑。蕭一山說「一部清史，就是一部中國近代史」；他不同意以近百年史為近代史，引李鴻章所說「三千年未有之一大變局」，以為三百年以前（即明清之際），「才是這『變局』的開端」（《清史大綱·引論》，頁1）。李澤厚則以明清之際為「近代與古代的分野」（《中國古代思想史論·經世觀念隨筆》）。史景遷說，為了瞭解現代中國，有必要追溯；「應該追溯多遠」是一個「關鍵問題」。他解釋自己的追溯的以1600年（即萬曆二十八年）為始點，是因為由此開始，「我們才能充分認識中國當前的問題何以產生，而中國人又能如何利用知識、經濟和情感解決它們」（《追尋現代中國 1600-1912 年的中國歷史》前

言，中譯本，頁4)。1600年，通常被認為進入了「明清之際」。¹

一種我們所熟悉的論述，是將明清之際（或者明代）比之於歐洲的文藝復興或啟蒙運動時期。思想史家侯外廬認為明清之際有「啟蒙思潮」。他在《論明清之際的社會階級關係與啟蒙思潮的特點》一文中說，其時中國思想家的觀點，「不完全等同於西歐以至俄國的『資產者—啟蒙者』的觀點，然而，在相類似的歷史發展情況之下，啟蒙運動的思潮具有一般相似的規律。」（《侯外廬史學論文選集》下冊，頁82）周作人考察新文學之所由來，以明末的文學為「現在這次文學運動的來源」（《中國新文學的源流》，頁29）。在他的論述中，作為「來源」的明末文學（公安、竟陵派，張岱等），與五四新文學，幾乎是同質的。錢基博則徑直說：「自我觀之：中國文學之有明，其如歐洲中世紀之有文藝復興乎？」（《中國文學史（下）》，頁845）不難注意到的是，以上論述無不著眼於「起源」，關注無不在有關的時段開啟了（同時結束了）什麼。

「起源」問題從來被認為有特殊的重要性。近代的「始點」的確認，無疑是嚴重的意義賦予。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曾經被作為「熱點」的關於明代「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的討論，就包含了與「起源」有關的敘事。²即使「前近代」，強調的也是與起源的關係。所有這些

1 關於「近代」的始點，另有其他判斷。錢穆說：「明代是中國近代史的開始時期，同時也是世界近代史的開始時期。」甚至說，「現代中國大體是由明開始的」（《中國歷代政治得失》，頁102）。蔣廷黻的《中國近代史大綱》則以為近代始於19世紀。該書開篇即說：「中華民族到了19世紀就到了一個特殊時期。」溝口雄三就將東林活動的那一時期劃入「前近代時期」，即「近代的前期，換言之亦即近代的萌芽時期或準備時期」（《所謂東林派人士的思想》，《中國前近代思想的演變》中譯本，頁341）。謝和耐則認為，因了「新的勢力」（即商人階層）的興起，「在宋代時期尤其是在13世紀，透出了中國的近代曙光」（《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國日常生活》中譯本，頁37）。

2 侯外廬《論明清之際的社會階級關係與啟蒙思潮的特點》：「中國歷史上的資本主義

涉及「起源」的論述，屬於最具影響力的 20 世紀學術關於明清之際的意義發現。

有朋友向我推薦了法國大革命研究專家弗朗索瓦·傅勒的《思考法國大革命》，那本書說，必須打破「紀念性史學的怪圈」，「必須去掉它給後人留下的常識意義，還它以同樣是歷史學家應具備的……知識上的好奇心和非功利的歷史知識活動」（《思考法國大革命》中譯本，頁 18），其中就涉及了「起源論述」的問題。至於「紀念性史學」，下面將要談到的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可以作為範本。我注意到，儘管「紀念性史學」以其意識形態功能繼續受到重視，與「起源」有關的意義論述卻已不那麼當仁不讓地居於重要地位。這無疑有利於打開新的視域，打開新的想像空間，使關於那段歷史的思考有可能多方面地展開，也為不同的敘述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事實上，與「近代」有關的起源論述也強力地誘導著我關於明清之際的思考，只不過我對此較為自覺，有意識地抵拒，保持質疑態度，試圖開出另外的路徑而已。走向「近代」是一個已然的事實，問題只在歷史回溯中關於「近代」的設定，我們的敘述中作為了「目的地」的是何種「近代」，以及這整個「目的論」的敘述方式。我質疑的、暗中與之對話的、試圖校正的那種論述，始終伴隨著這項研究。我的經驗是，拒絕一種預設，不但難以脫出那種預設的隱隱制約，而且拒絕本身也造成制約。意識到這一點，必定有益。但也應當說，「起源敘事」仍有可能提供富於解釋力的敘事結構。你不可能達到某種終極的解釋、敘述。保持對自己的研究的質疑、反省態度是極其必要的。這也正是為學術研究所必要的態度、狀態。

萌芽究竟以什麼時代為轉捩點呢？我們以為應以明嘉靖到萬曆年間，即十六世紀中葉至十七世紀初葉，為最顯著的階段。」（《侯外廬史學論文選集》下冊，頁 66）

另有一種關於明清之際意義的認定著眼於特有，以更直接的、個人的「感受」為依據。侯外廬以為 16 世紀，特別是 16 世紀後半期至 17 世紀的中國，哲學思想之活躍，可以比美於戰國諸子百家爭鳴的時代（《十六七世紀中國進步哲學思潮概述》，《侯外廬史學論文選集》下冊，頁 1）。李學勤序《顏鈞集》，說自己和楊超先生從事《中國思想通史》第四卷的寫作時，「對十六七世紀思想文化的宏富，有強烈的感受」，「特別有興趣於明清之際」，以為「明清之際是中國學術史上的一個大時代」，「大家輩出，其氣魄之盛偉，貢獻之卓異，堪與先秦百家相比美」。情況通常是，「強烈的感受」有可能啟動一項研究。梁啟超曾說明代「士習甚囂」（《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十五，頁 410）。「囂」，換一種說法，未始不就是士氣「張」表現於講學，表現於大規模的「黨社運動」，表現於泰州學派，以及公安、竟陵派的反主流（當然也如「反主流」通常的命運，自身不免終成主流）。所有這些，給人的感覺就是「生氣勃勃」思想、言論、行為。也有的研究者取其一端，比如名士文化，由秦淮河邊的舊院，到晚明小品（小品作者非即名士，但小品往往成為名士趣味的載體）。凡此，都是明清之際的吸引力所在。我自己比較傾向於「特有」這一時期提供的富於深度的思想、言說，某些似乎前無古人而又難以再現的現象、過程，當然更有惟這一時期才有、才能造出的人物。這不消說與我的專業背景有關。

明清史的魅力，也因了與近人經驗的相關性不止在時間的相近，也在便於取喻，展開與當前、當下有關的言說。無論「前近代」、「近代」，「資本主義萌芽」，明清兩代的經濟發展與科技成就，不都被作為與「現代性」有關的論述的題中應有之義？

事後看去更富於戲劇性的，是明清對抗被認為的與 20 世紀上半期中國的抗日戰爭的相關性。據說「從二十年代末至四十年代，明末

的歷史越來越引起了活躍在中國政治舞臺上的各黨各派的關注，形成了持續達十餘年之久的『晚明熱』（王守稼、繆振鵬《甲申三百年祭及其在現代史學史上的地位》，《甲申三百年祭風雨六十年》，頁158）。其間一個標誌性的政治／文化事件，是圍繞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展開的。

發表於五十年後的王戎笙《依然是警鐘重讀甲申三百年祭》一文，如此敘述事件的緣起：「蔣介石鼓吹的『攘外必先安內』的理論，是以明末的歷史作為依據的。影響所及，當時各界、各派政治勢力在談古論今時，都有一個共同的模式：把明朝比作當時的國民政府，把李自成、張獻忠領導的農民軍比作共產黨領導下的八路軍、新四軍（或此前的紅軍），把雄踞關外虎視眈眈的清軍比作入侵的外敵即日本帝國主義者。……這樣的歷史比擬到處傳播，流風所及，形成了一種思維定式。」（《甲申三百年祭風雨六十年》，頁170、171，原載《中國史研究動態》1994年第5期）由同時期的文學與史學看，這一整套符碼的確嚴重影響了人們想像明末歷史以至讀解史學文本的方式。³

發表於「事件」中的葉青《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平議》，指郭的《甲申三百年祭》「以明朝隱射國民政府」（《甲申三百年祭風雨六十年》。該文收入葉青編《關於甲申三百年祭及其他》，獨立出版社，1944年8月）。在葉青筆下，李自成更明確地指涉陝北的共產黨，明

3 北京大學中文系博士生王家康的學位論文《抗戰時期思想文化背景中的歷史劇寫作》，有關於抗戰時期南明題材的歷史劇的分析，以大量材料論述了那一時期南明之為象徵符號。那一時期南明題材的歷史劇，就有阿英的《南明遺恨》（《碧血花》，又名《葛嫩娘》）、於伶的《大明英烈傳》、郭沫若的《南冠草》，等等。那篇論文討論了南明之為符碼的複雜意涵。大致同一時期的學術，與南明劇共用一種想像，即或明或暗地，以明清對應中日。

朝即國民政府，清即入侵的日本，隱喻轉成明喻，與現實對接。《甲申三百年祭》發表前，即有「國民黨的學術機構」發表《論建州與流賊相因亡明》一類文章，被認為以「流賊」影射共產黨武裝（參看收入《甲申三百年祭風雨六十年》的《甲申三百年祭寫作前後》等文）。⁴

關於明亡，錢穆《國史大綱》中的「其時對流寇常以議撫誤兵機，對滿洲又因格於廷議不得言和，遂至亡國。若先和滿，一意剿賊，尚可救」云云，一再被指為系向「國民政府」獻策。直至刊出於1987年的王錦厚的《甲申三百年祭的風波》一文，仍將錢氏的上述議論坐實為惋惜國民黨未能貫徹「攘外必先安內」的策略，以《國史大綱》中的上述內容，為蔣介石《中國之命運》有關內容的注腳；另引周作人文，對周說李自成「比得過明太祖」放過不論，而只摘出其以李為「流賊」；得出的結論是：「國統區、淪陷區的一些文人就這樣熱衷於明季歷史的研究，都想從中找出宣揚《中國之命運》法西斯理論的歷史根據，以便實現蔣介石、日本帝國主義者在兩年之內消滅共產黨及其根據地的狂妄預謀！」（《甲申三百年祭風雨六十年》，頁310-311）「攘外安內」的說法在明代早已有之，到了明末只是被更加頻繁地提起罷了。⁵對張獻忠、孫可望，魯迅也以「流賊」指稱（《病後雜談》）。其實這種提法早已通用，不便據以推斷對農民軍的態度。

出版於2003年的樊樹志的《晚明史（1573-1644年）》，說明軍剿

4 配合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發表在1944年3月19日《新華日報》上的署名文章《三百年前》提到，至今「許多無恥的漢奸所幹的正是當年的洪承疇、吳三桂的勾當」（《甲申三百年祭風雨六十年》，頁44）。同年4月18日《解放日報》轉載《甲申三百年祭》編者按，也提到了「無恥地投降了民族敵人引狼入室的吳三桂之流」，及「現在有些吳三桂們」（同書，頁89-90）。

5 洪武三十一年明太祖敕燕王朱棣，中有「攘外安內，非汝其誰」云云（《國權》卷一〇，頁782）。

「賊」所以功敗垂成，乃因崇禎「在攘外安內的兩難選擇中作出了錯誤判斷，致使形勢發生劇變，坐失安內的大好時機」（頁988），已不認為應有所避忌。我還注意到樊樹志用「內戰內行外戰外行」評論洪承疇（同書，頁1033）。⁶寫於2006年的陳生璽《明清易代史獨見》增訂本前言，說明朝「本可以與清方議和，獲得暫時喘息的機會，先專力解決農民軍問題，然後再解決遼東問題」（頁2）。不用「安」、「攘」字面，說的是同一問題。有關「安」、「攘」的話題的開放，意味著其敏感性的消失，卻不能理解為隱喻層面所指涉的「歷史」的重新評估那是另一回事。第一個將抗日戰爭與明清對抗比擬的是誰，或已難考。這一套比喻因發展得相當完整，難免暗中介入我們關於明清之際的想像，滲透進了我們的有關知識，或多或少地塑造了我們看取明末清初歷史的方式。於是有了奇特地疊印的「歷史」真是一段特殊的歷史因緣。對於所謂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這或許是一個極端的例子。⁷

6 樊樹志的《晚明史（1573-1644年）》第十一章標題為「民變蜂起：舉棋不定的撫與剿」，第十二章標題為「攘外與安內的兩難選擇」。樊氏該書說，到明末，「安內方可攘外」，其實是一個「傳統話題」，楊嗣昌不過重申而已；「在當時不少有識之士看來，必須首先解決內憂才能排除外患」（頁971）。同頁注3：「遠的且不說，萬歷朝的政治家張居正也曾說『欲攘外者必先安內』，見《張文忠公集》卷一《陳六事疏》。」該書另一處說，今天的人們倘若「設身處地從明朝的視角觀察時局，那麼不得不承認，楊嗣昌所闡述的攘外必先安內的方針，實在是當時唯一可取的選擇」（頁972）。很難斷定寫作《國史大綱》的錢穆意在影射，還是在說一個關於明末軍事的老話題。

7 20世紀上半個世紀，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運動、抗日戰爭，影響於學術活動，是學術史考察的內容，這裡需要的是知人論世。傅斯年的《東北史綱》初版於1932年。卷首《引語》曰：「滿洲本大明之臣僕，原在職貢之域，亦即屬國之人」（《傅斯年全集》第二卷，頁375）。該書撰寫時，「東事」正亟，開篇即道：「中國之有東北問題數十年矣」（頁374）。王汎森說：「《東北史綱》是傅斯年在『九一八』事變之後心焦如焚下趕出來的作品，主要是為了說服國聯李頓調查團東北自古以來是中

所有這種想像、類比，都妨礙了我們「空著雙手進入歷史」（語見溝口雄三《關於歷史敘述的意圖與客觀性問題》，《學術思想評論》第11輯，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卻又使我們保有了對於這一時段的新鮮之感猶之對於近世近事。我們說歷史「活著」，說歷史「活在……」，問題是緣何活著，活在何種情境、問題、論述中。記憶緣何被喚醒？類比緣何而進行？明清之際這一段往事的一再被翻動，也可以作如上的追問。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明清之際是因了發生於其後的事件、過程而得到解釋，獲取意義的。這段歷史也就借此而「活在」當代尋找資源（來自往事的啟示、支持），尋求象徵，探尋對當前、近事的詮釋以至描述方式。

國領土」（《思想史與生活史有交集嗎？》，《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頁325）。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自序》：「斯編初講，正值九一八事變驟起，五載以來，身處故都，不啻邊塞，大難目擊，別有會心。」該書初版於1937年（商務印書館）。錢氏《國史大綱》完稿於1939年，《書成自記》中說，1937年，「盧溝橋倭難猝發，學校南遷」，輾轉流徙，「自念萬里逃生，無所靖獻，複為諸生講國史，倍增感慨」（頁3）。《引論》則有「異族統治垂三百年，其對我國家、社會、文化生機之束縛與損害，固已甚矣」云云（頁20）。據說錢氏在西南聯大講授此課時，「總是充滿了感情，往往慷慨激越，聽者為之動容」（何兆武《歷史理性批判散論·自序》，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錢穆曾激烈地批評明初士人的元遺心態，指摘那些士人昧於《春秋》大義。蕭公權則表明其尊夏攘夷，認同王夫之、呂留良的「民族主義」。蕭氏的《中國政治思想史》初成於1940年，五年後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諸書情緒激越處，的確要部分地由所處歷史情境來解釋。分享了類似想像的，還有蕭一山的寫成於1944年的《清史大綱》。該書的內容安排以「民族革命」（包括反清復明）為主線，畸輕畸重，「時代印記」格外顯明。蕭氏以反清與反「帝國主義」（包括反「列強」與抗日）為「始終一貫」的「民族革命」、「民族解放運動」（《引論》，頁1-2）。該書上海古籍出版社版杜家驥《導讀》中說，「由於作者把滿漢民族矛盾與中國和東西方帝國主義列強的矛盾視為同一性質，因而混淆了反對外國侵略中國的民族運動和國內反滿活動之本質」（頁12）。但蕭一山又有如下說法：「第一期滿清和列強，都在壓迫我們，到第二期滿清和我們『同等共處於中國之內』，只剩下列強了」（《引論》，頁8）。他對此的解釋是「變」，也令人可感尋求正確表述的努力。

即使不完全屬於起源論述，明清之際也往往被作為一種長時段考察的始點。梁啟超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錢穆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有關學術史的考察，均以 17 世紀、明清之際為始點。河北教育出版社「二十世紀中國史學名著」孟森一集，王鐘翰的《前言》有如下設問：「孟森既是清史最高權威，何以其著作被收入《明清史論著集刊》而不獨標清史之名？」在我看來，「清史專家」這一身份對於孟森不全適用。科場、奏銷等案，王紫稼、橫波夫人、金聖歎等人物，均在「之際」，涉及兩個朝代。學術前輩的實踐，為歷史研究不必為斷代所限提供了例證。至於大量文化現象的研究，也必待追溯；至於追到哪裡，不消說取決於你的知識準備與思想能力。

王夫之說：「《易》有變，《春秋》有時，《詩》有際。善言《詩》者，言其際也。寒暑之際，風以候之；治亂之際，《詩》以占之。」（《詩廣傳》卷四，《船山全書》第 3 冊，頁 458）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詩便工，說的是文學寫作的條件，屬於古人的經驗之談。詩人善寫治亂之際，確也是文學史的一種事實。馬克思有關於藝術的繁榮時期不與社會的一般發展成比例，不與物質基礎的一般發展成比例的著名論斷。⁸發生在明清之際的文學過程，大可为馬克思的上述論斷作注腳。

我自己的研究，更與短時段的政治史有關：肯定「易代」作為政治事件的意義，同時力圖探入「深層」，即易代中社會、人生變動的深層原因及意義。當然，在實際研究中，也極力伸展，向上向下，伸展到嘉、隆之際，以至明初力圖兼有長時段與短時段的視野。即使不認為「政治」在歷史視野中據有核心位置，也無須蓄意貶低政治在歷

8 馬克思：「關於藝術，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榮時期決不是同社會的一般發展成比例的，因而也決不是同仿佛是社會組織的骨骼的物質基礎的一般發展成比例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引自《馬克思恩格斯論文藝和美學》，頁 536）

史生活中的意義。「政治」在人性中，在人的世界中，在錯綜複雜的人的諸種關係中。它不是外在於人的「背景」、「佈景」；在許多情況下，它確乎是「人的生活」的一部分，甚至不外在於「日常」。「政治」與「日常」原非對立兩項。將「日常」設定為排除了「政治」、「重大事件」、「特殊時刻」，何嘗不是出於偏見！

當然也應當想到，以改朝換代為特殊歷史瞬間、為界標，難免於政治史傳統視野的限囿，比如預設了變與常。意識到這一點，有利於達到複雜性，也有助於保持研究中的反思態度。任一時代即使正史所謂的「王綱解紐」、文人所說的「天崩地坼」，都有變與不變，這本是常識，卑之無甚高論，困難在於描述、展現變與不變糾結纏繞的具體過程，複現生動豐富的「歷史生活」。需要追究的就有，發生在這種時刻而被既有的論說所刪節的，是一些什麼。我相信上述「歷史瞬間」、「危機時刻」的歷史生活，遠未被充分地清理；無論「正史書法」，還是近代的學術文體，都妨礙了呈現。

至於我自己，則並非想清楚了「易代之際」的意涵，才動手做研究的，也證明了已有的預設、既經形成的視野對於研究者的誘導。即使如此我也相信，並非任一改朝換代的時刻都有同等的研究價值。使我事後肯定了自己當初的選擇的，不是上述已成共識的「思想史意義」，而是人物及其言說的分量。在我看來，「明清之際」提供了審視「人在歷史中」的富於深度的材料。而這一時段在解釋方面的爭議性，其可供想像的空間，再敘述的可能性，確也不是任一「之際」所能比擬。我對這一時刻的重要性的感受更來自閱讀。借助於「明清之際」這一歷史瞬間的特定性，其對於士人命運的影響，有助於在兩個方面的入深：人，與歷史。人在這一時刻的反應，處這一時刻的姿態，其中正有所感興趣的「人的世界」的豐富性。這種豐富性確也在一個瞬間、時刻集中而廣闊地展開。明清之際之於我，不是現成的